

压抑、创伤与救赎：精神分析视域下《后悔录》曾广贤的悲剧命运

俞汶宜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后悔录》中曾广贤的悲剧根源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社会对个体的压抑，另一方面是荒诞命运对个体的无情捉弄。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审视《后悔录》，可以发现曾广贤未遂的欲望及其心理困境与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冲突密切相关。革命年代的禁欲规范被曾广贤内化为其“超我”的雏形，并通过阉割恐惧迫使其“自我”遵循唯实原则，以压制“本我”的原始欲望。而在纵欲时代，这种创伤性的阉割恐惧并未消散，反而随着持续性的自我质询演化为更为复杂的乱伦焦虑。当性欲一再被压抑而无法得到宣泄时，曾广贤将回忆性的自我言说作为替代性的满足途径，在建构自我历史的过程中实现了欲望的升华，完成了从压抑到救赎的心理蜕变。

关键词:《后悔录》；精神分析；力比多

Suppression, Trauma, and Redemption: Tragedy of Zeng Guangxian in "The Regret Record" from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Yu Wenyi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Zhejiang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The tragedy of Zeng Guangxian in "Regret Record" has a dual root cause: on one hand, it is the suppression of the individual by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he cruel teasing of the individual by absurd f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Zeng Guangxian's unfulfilled desires and psychological predica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flicts among the id, ego, and superego. The ascetic norms of the revolutionary era were internalized by Zeng Guangxian as the rudiment of his "superego", and through the fear of castration, it forced his "ego" to follow the reality principle to suppress the primitive desires of the "id". However, in the era of indulgence, this traumatic fear of castration did not dissipate but evolved into more complex incestuous anxiety through continuous self-questioning. When sexual desire was repeatedly suppressed and could not be vented, Zeng Guangxian took the self-narrative of memory as an alternative way of satisfaction, achieving the sublimation of desir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his self-history and completing the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suppression to redemption.

Keywords: The regret record; Psychoanalysis; Libido

0 引言

东西的《后悔录》以“如果你没意见，那我就开始讲了”开篇，整体故事的推进依赖于第一人称“我”即曾广贤的自我讲述，所谓的“后悔录”实则是曾广贤深陷“后悔”情绪状态下对自我过往历史的重构与表述。在这里，曾广贤同时承担了“讲故事的人”和“故事参与者”两种角色，故事事件的选择乃至事件本身的意义，是由“叙述自我”在回顾中赋予的，而非“经验自我”在经历时所感受到的。换言之，叙述者构建故事叙述话语的过程是一种主体显现的自觉行为。作品细腻描绘了历史转折期曾广

贤复杂的心理活动，内含丰富的自白式精神分析，揭示了时代巨变下个体的主体世界如何遭受压抑与阉割。东西曾说：“多年前写《后悔录》时，我就有意识地向人物内心开掘，并做过一些努力^[1]。”从精神分析视角审视这部小说，可以发现《后悔录》中曾广贤从欲望受阻到最终性无能的演变，与其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冲突紧密相关。本我长期受制于超我与自我的双重束缚，即便偶有突破，也未能迎来真正的解放，反而加剧了自我对本我的限制。此外，他人与自我因力比多本能驱动失败而遭受惩罚的创伤记忆，进一步诱发了“幻觉”与乱伦焦虑，最终导致曾广贤

的性欲冲动完全丧失，在性欲本可得到轻易满足的时代背景下成为“性无能者”。不过尽管如此，曾广贤的性欲并未消逝，反而在痛苦中持续纠缠，迫使他寻求替代性的宣泄途径，最终曾广贤将快感从生殖器转向口腔，通过语言重构创伤记忆获得欲望的满足，以艺术的形式实现了性欲的升华。

1 囿于高塔和压抑的“力比多”

力比多，作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内涵经历了从单纯的性冲动到涵盖身心两方面的性本能的扩展，弗洛伊德指出，“力比多既是自然状态的性欲，又是心理的欲望或对性关系的渴求^[1]。”《后悔录》中的主人公曾广贤性欲不遂直至性无能的经历，便是其“力比多”被社会规范与内心道德不断压抑的生动写照，深刻地体现了“囿于高塔”的困境。可以看到《后悔录》中，曾广贤的“力比多”，即其本能的性欲，受到了来自超我和自我的双重压抑。小说开篇就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一个性教育缺失、性观念保守的年代，即曾广贤的成长岁月恰逢革命话语压制下情欲禁忌最为严苛的时期。在将性视为“资产阶级毒草”的特殊历史阶段，娱乐场所几近绝迹，日常生活被简化为政治集会和革命歌曲的单调循环。课堂教育刻意回避任何生理卫生知识，人际交往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道德高墙，情欲表达更是成为必须被彻底清除的思想污染源。这种极端的禁欲实践，不仅将性驱动力压抑到社会无意识的最底层，更将私人空间中的夫妻亲密行为都打上了“思想不纯”的嫌疑。这样的伦理禁忌以致政治规范最终导致曾广贤对性的最初印象，停留在交配的两只花狗被众人围观又被暴力制止的惨状。而这一事件不仅给曾广贤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更在无形中塑造了他对性的恐惧和排斥。

弗洛伊德指出，自我产生之初的能力还不足以完全驾驭“本我”的本能反应，这个时候对“本我”的压抑主要来自于“超我”，而个体在未成年时期主要是通过父母和学校形成超我概念。学校教育其实已在上文点出，小说开篇的寥寥几语交代了学校教育中性教育的缺失，“不谈性”便是性禁忌的一部分，而“谈性色变”更体现了性禁忌的规训意味。两只花狗的交配本就符合生物天性却被仓库众人当作特殊时期的“一点乐子”，而以政治话语威胁众人又强行制止两只花狗，将其尸体作为警示道具的赵万年却是当时的教育权威——学校校长。而曾广贤的母亲吴生则是在领导的革命话语规训下，以十年严格的性压抑从内到外践行清除不洁，在曾长风被狗的交配画面挑起性欲时，

她不仅指责对方的求欢与狗无异更是以死逼之，“那你还不如用刀子把我结束算啦。我用了十年，放了一提篮的漂白粉，才把自己洗得像白球鞋这么干净，要是你对我还有一点革命友谊，就请你离我远点，不要往白球鞋上泼墨水^[2]”。可以看到，身体政治学方面的话语规训已经被她内化为存在论层面的清洁仪式——漂白粉与肥皂的清洗行为，已然超越了物理层面的去污功能，转变为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超我对本我的暴力压制。当曾广贤戳破曾长风的出轨秘密时，吴生虽然震惊但还是平静接受甚至企图维持家庭原状，可在曾广贤无意发现园长对她的性骚扰行为时，本是受害者的她却无法忍受自己清洁的形象毁于一旦，转身毅然选择了以殉道姿态（舍身饲虎）维护自身的道德纯洁性。这种以死亡完成的自我净化仪式，即献祭般的身体实践既是对革命禁欲伦理的终极效忠，也是对权力话语最惨烈的控诉。

而在学校教育和母亲影响的双重作用下，革命禁忌伦理逐渐被固植于曾广贤的内心，成为其人格中“超我”的组成部分和他压抑自己性欲的强大力量。换言之，在曾广贤的自我还尚未觉醒之时，“超我”就已经牢牢控制和压抑着“本我”。由此，尽管曾广贤看到了父亲每天晚上的痛苦和煎熬，但还是背叛了夫妻伦理和道德伦理，与赵山河偷情的父亲曾长风是“流氓”，被惩罚殴打是“活该”，甚至于他一再主动向赵长风举报父亲的“违禁”行为企图扭转父亲心理，加以观念洗礼与同化，他对母亲死亡的评价也是，“她不羞死才怪呢，连我都替她害羞^[3]”。可以看到，成长初期的曾广贤通过内化革命道德准则形成的超我系统，不仅成功抑制了自身本我的原始冲动，更成为监督他者的道德审判工具。而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当曾广贤重新认识到性欲作为人类本能的合法性时，其人格结构出现了新的裂隙与调整。

小说呈现了两次本我的尝试突破，都因外部现实的强力干预而宣告失败。这种双重挫败经验与童年期间的创伤记忆相结合，最终导致了自我防御机制的过度补偿，其结果是，本该作为本我和超我之间调节者的自我，异化为比超我更为严苛的压抑装置。面对小池的精心打扮和性的诱惑，曾广贤虽曾呵斥并责骂对方，但之后的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体现了其“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当“本我”冲动终于战胜“超我”限制时，现实却给了他一记重击，小池另有男友，曾广贤的“力比多”在痛苦和迷茫中愈发扭曲和挣扎。面对性幻想对象张闹，在于百家的话语引诱下曾广贤经历了数次“本我”与“自我”

的冲突,象征理性的“左手”最终还是无法压制“右手”的本能冲动,尽管自我清楚地知道强奸张闹是犯法行为,但“力比多”的冲动却依旧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最终导致了“自我”的溃败和“本我”的胜利。曾广贤无法控制本我欲望夜袭张闹,强奸未遂却被判坐牢十年。而在刑满释放后,他未经任何心理准备便踏入了一个充满自由与放纵氛围的时代,以往的性欲禁忌已被破除。然而,多年的牢狱生活曾使曾广贤不断回顾往昔,那些由“本我”冲动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以及身边众人因突破性禁忌而遭受惩罚的惨痛记忆,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难以磨灭的“阉割恐惧”。

因此,尽管曾广贤在重获自由后有多次机会能够发泄性欲,可“本我”冲动带来的创伤记忆迫使他寻求婚姻制度的庇护。这种心理转变实则显示了曾广贤的“本我”受到了“自我”和“超我”的双重压抑和围剿。一方面,“自我”作为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智与判断部分,被过往的惩罚性经验深刻影响,以至于主体在潜意识中将快感与惩罚建立了病态的联结,自我的防御系统对任何非制度化的性冲动都实施了先发制人的压制。另一方面,在道德律令维度,超我作为内化的社会禁忌系统,依然顽固地维持着革命年代的欲望管控范式,它将婚姻制度神圣化为唯一的性欲宣泄途径。曾广贤一个原先只求发泄性欲的人却在之后频频克制,暴露了人物在原先革命年代形成的认知依旧未变的事实,即坚持性欲必须被严格限定在夫妻之间的私密关系中。自我通过现实焦虑抑制本我,而超我通过道德羞耻进一步强化这种抑制,两者叠加的压抑效果,使曾广贤的性心理发展固着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反应形成”阶段——其对婚姻制度的过度执着,其实是希望通过将性欲严格限定在婚姻框架内来逃避潜意识中对性冲动本身的恐惧。可这种防御机制虽然短期内能够缓解焦虑,却会导致其人格发展的进一步僵化,这时的曾广贤尚且还算是性欲不遂,之后却沦为了彻底的“性无能”。

2 自我质询中的乱伦焦虑

尽管社会往往倾向于压抑个体的力比多冲动,但人类欲望的力量却异常强大,往往难以被彻底遏制,小说中人物的性欲困境深刻揭示了弗洛伊德所言的“压抑的复归”这一基本心理机制。以曾长风为例,其力比多冲动本可像他人一样通过制度化婚姻渠道得到合法满足,却被吴生暴力切断长达十年,又被花狗交配轻易点燃,夜间持续的燥热感实际上是心灵深处的欲望之火在熊熊燃烧。在尝试多种方法灭火失败后他最终违背了家庭伦理和夫妻伦理,其

本我对超我的突破暴露了文明压抑的脆弱性。而赵敬东对其表姐张闹的乱伦欲望更是因社会制约和道德伦理束缚而扭曲变形,他将爱欲对象的名字移植到宠物犬身上,通过人兽性交的方式实现自我欲望的扭曲满足。很有意味的是,小说开头提到的犬类交配场景极具象征内涵,构成了一个精妙的精神分析寓言。如前面提及的,在个体心理发展层面,犬类交配作为曾广贤初识生理以及点燃曾长风性欲的“原始场景”,以其未经修饰的动物性,解构了革命话语精心构建的性纯洁神话。这种自然本能对文明规训的胜利,印证了弗洛伊德关于“本我”不可摧毁性的基本判断,正如小说中一再描述的,即便遭受围观、殴打、碾压乃至悬挂示众,交配中的犬类依然保持着生理性的连接,这种顽固的黏着状态,恰似力比多能量对压抑机制的永恒抵抗。

禁欲时代尚且无法把控个人的力比多冲动,更何况恣意开放的新时代。问题是,前面曾广贤性欲不遂尚且源于超我、自我对本我的双重压抑,或因为对社会现实可能施加惩罚的阉割恐惧,但当外部规训环境已然消解,即仓库改造、婚姻解体之时,他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更为无力的性无能状态。按摩店这一情色空间的建立,非但未能成功解除其心理禁锢,让他像其他人一样拥有纵欲的可能,反而激活了其心理深处的乱伦禁忌或者说乱伦焦虑。

这种乱伦焦虑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心理成因,弗洛伊德曾指出,“如果力比多没有获得满足的途径,一方面坚持寻求发泄,另一方面又无法实现升华,那么所谓的节欲也只是导致焦虑的条件^[5]”,在他看来,性的节制和焦虑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后期的曾广贤已然不能算是一个直接意义上的力比多生命实体,曾芳的失踪到最后依然成谜,成为了他试图履行性事时的永恒“阴影”。只要他心中的邪念一冒头,就会看见女人們的右掌心里有跟他妹妹一样的黑痣,担心这些女人要不是他的妹妹,就是他妹妹的女儿。而这种焦虑的滋生看似突然,实则是外部压力彻底内在化后的心理障碍,与他一再反思自我过往的后悔心绪密切相关。

曾广贤的“后悔”并不是对他人负罪的忏悔,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自我质询,其后悔之情依据所回溯事件的性质,可清晰地划分为两大范畴:一类聚焦于他在引发他人不幸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言语上的过失,诸如因为多嘴对父亲、赵敬东及小池等人无意间造成的伤害,这些成为了他内心深深自责的源泉;另一类则关乎他对自身不幸的反省,主要体现在行为决策层面,对自己那些导向不幸后果的选择与行动感到后悔。在这双重懊悔的交织中,曾广

贤回忆与倾诉持续不断，但他对于自身及他人遭遇不幸的根源分析，却从未累及他人，而是始终指向自我，所有的心理剖析也都是围绕自己当下的思绪与举止展开。概言之，在他人及自我命运的交织中，他更专注于对自我角色的审视与责任分析，从自身行为中寻找问题的根源。即使在回溯自己对他人背叛的经历时，有提及到他人的背弃导致他的处境难堪，但言辞之间却依旧难觅责备之意。必须注意的是，《后悔录》的叙事话语是曾广贤的回忆性言说，可叙述自我却不为经验自我辩解，反而持续开垦自我心灵。

事实上，这种自我质询的人格特质是其在父亲影响下形成的另一部分“超我”。在小说开头的关键场景中，当曾广贤因狗的死亡谴责父亲时，曾长风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他率先将棍子递给赵万年，那句“不要动不动就赖别人，要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⑥”的训诫内化为曾广贤人格中严苛的自我审查机制。这种机制导致主体将自我遭受的外部创伤事件通通化为自我归罪的叙事模式，甚至将尚未发生的事情也转为一种潜在的焦虑试图躲避力比多的要求。无论是社会现实力量还是他人人性之恶，都促成了曾广贤的自我阉割。即便在客观责任不在自身之时，曾广贤依旧执着地质询自己而不是外在的他人、社会或是命运。这种单向度的自我质询，本质上是一种未完成的主体性觉醒：它既显示出个体对压迫的模糊认知，又表明其缺乏彻底反思社会规训的能力。曾广贤的病理性自省在家庭破裂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曾广贤在记忆重构的叙述中将叙事焦点放在“多嘴揭发”，写自己是如何在说与不说之间挣扎，是如何被母亲带着去封嘴巴，这种叙事偏移实际上暴露了超我对创伤记忆的扭曲作用。

更为悲剧的是，这种自我归罪的思维模式与早期的创伤经验形成了致命的结合。在一切都好似尘埃落定时，曾芳却依旧处于失踪状态，而妹妹消失与母亲死亡在时间上的毗邻性令曾广贤在无意识层面将这两个关键事件建构成因果关系，更关键的是，无论是父亲出轨，还是母亲死亡、妹妹失踪，这些事件都与性有着紧密的关联（前者源于父亲的性压抑，后者涉及母亲被性骚扰），这使得性本身在曾广贤的心理图式中被标记为危险与罪恶的能指，并最终导致曾广贤出现了严重的性功能障碍，其力比多陷入乱伦焦虑的泥淖中而再无法突破。事实上，当个体的超我结构过度依赖自我惩罚时，即便外在的压抑环境消失，主体仍会创造新的方式来延续对自己的审判。这种自我囚禁的心理机制或许才是革命年代留下的最顽固的精神遗产。

3 替代性宣泄下的欲望升华

弗洛伊德提出个体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共同构筑，个体要实现正常的思维与行为功能，这三方面的人格结构必须维持一种动态的和谐与平衡。在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框架下，曾广贤内在的力比多冲动遭遇了来自“自我”与“超我”的双重压抑，特别是当乱伦焦虑显化的“幻觉”反复出现后，其从“本我”向“自我”转化的路径被彻底阻断，从内在冲动到实际行动的可能性也被杜绝。而压抑机制若无法得到适当的宣泄，将严重干扰个体的意识功能与神经系统的正常运转。在直接释放力比多冲动、寻求“本我”即时满足的努力失败后，个体需寻求替代性的宣泄途径以满足“本我”的需求，从而维系人格结构的整体和谐与稳定。对于曾广贤而言，看似拥有了能保护他人、坚守道德伦理的身体“自生”盾牌，可性欲的压抑与无性生活的痛苦依旧如影随形。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他开始向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试图通过叙述来寻求心灵的慰藉。然而，他的倾诉一开始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甚至遭遇了他人的回避与冷漠：于百家和荣光明作为儿时的发小像躲债一样躲着他，生怕他耽误生意，张闹更是直接不接电话。没办法，曾广贤不得不转向付费倾听者或是向无法回应的植物人父亲倾诉，而倾诉过程实质上就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以“如果你没意见，那我就开始讲了”作为叙述的开场白，曾广贤不仅是在重构自己的历史，更是在这一过程中从自我的视角出发不断地赋予过去事件以新的意义。

《后悔录》从始至终都是曾广贤对自我过往经历的建构和言说，小说以条件式的“如果”开篇并在终章形成排比式复现，这种通过虚拟语态对线性历史进行解构的方式，使得过去始终处于可被阐释的开放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述并非独白式的内心剖白，而是面向他者的表演性言说，其叙事选择始终受到“凝视”机制的调控。在追忆与讲述中，曾广贤挑选了对自己人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叙述，这些事件在“经验自我”那可能并无多大感受，却成为了“叙述自我”赋予意义的有意选择。换言之，曾广贤所追忆与讲述的历史，是虚构与真实交织的产物。他通过不断地补充细节，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叙述文本，这一过程既是他的艺术创作，也是他寻求性欲宣泄的替代性途径。

从弗洛伊德的理论视角来看，艺术可以作为一种幻想式的替代，为艺术家提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愉悦体验。若艺术家能够成功地将自己的幻想与他人分享，那么

他便能从艺术中获得现实生活中缺失的补偿,如荣誉、权力以及男女之爱。在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曾广贤升华了自己的性欲,获得了欲望的满足。换个视角审视,曾广贤选择“说”而非“写”的创作手法,实则蕴含了一种性欲转移的深层动机。弗洛伊德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的性欲不仅局限于生殖器官,它还潜藏于口唇、肛门乃至其他身体部位。小说明明从性禁忌时代开始讲述,但围绕主人公个体的成长叙事,却触及到了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性议题:性惩罚、性骚扰、偷窥、意淫等等,故事情节何尝不是一场性探索之旅。曾广贤,这位在生理层面无性体验的人,却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畏的“笔触”,肆意描绘着“性”的万千形态。换言之,在看似“无性”的叙述表层下,他实则以一种近乎放纵的方式,专注于探讨这唯一且核心的话题,从而以口腔转移的方式实现了自我性欲的满足。有学者深刻洞察到,曾广贤的讲述不仅是对性生活变迁的忠实记录,更是对性活动过程的细腻模拟。“言词为根,耳朵为接收孔道,曾广贤吞吞吐吐,反复张合,话语在小姐的耳朵里进进出出。叙述声音代替了写作行为。虽然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作为一种自慰行为,但作者也在邀请读者像那位小姐一样加入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将小说视为一系列自慰所留下的痕迹,或者是模拟中对读者的性活动所留下的痕迹^[7]”。

不过,曾广贤借话语言说这一方式完成的性欲升华虽成功实现了自我人格的平衡和稳定,在个体“本我”这一层面上完成了从压抑到救赎的心理蜕变,但却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重建。归根结底,曾广贤寻求性欲的替代性发泄渠道只是他讲述自我历史的一个目的,其更深层的目的在于通过语言重建认同,即试图在他者“凝视”下赢得同情和理解。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小姐还是父亲面前,曾广贤在回忆和讲述自身的性无能历史时,都采用了“后悔”这一特定的情感框架来组织经验。但当曾广贤看到父亲流出眼泪讲出自己人生唯一不后悔的事情是未触碰赵阿姨的时候,其瘫痪父亲的潜在听觉表明他一系列的后悔讲述都将沦为无用之功,即他将无法得到父亲毫无芥蒂的

同情。小说在父亲即将醒来的时刻戛然而止,这个精妙的叙事悬置暗示着:一旦父亲真正觉醒,曾广贤将陷入到对“多嘴”行为新的懊悔中,其后悔心绪的追忆又将有了新的谈资。而当曾广贤将对赵山河的不触碰自诩为人生唯一不后悔之事的时候,这种道德标榜实则暴露了其自我探索的肤浅性,一般而言,只有对自我进行深刻的剖析乃至决裂,才能实现灵魂向上的超越,凌驾于生命向下的世俗标准之上。可曾广贤对“多嘴”行为的反复懊悔和持续性的自我质询一致,恰似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永恒轮回,只是一种机械式的重复,而非真正的辩证扬弃。换言之,曾广贤始终处于语言的表层滑动,而从未抵达存在的本真维度,以至于他既无法真正面对过去,又在父亲将醒之际失去了拥抱现在的可能性。可以说,小说结尾这一叙事悬置将荒诞社会加压于个体身上的悲剧意味推向了另一重高峰:这个未完成的救赎叙事揭示了后革命年代个体精神状况的最真实写照,即历史暴力的碾压下,主体对自我的救赎终究只能是不彻底的,主体性的觉醒也往往只能以这种跛足的方式蹒跚前行。

参考文献:

- [1] 东西. 回响[D].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 [2] 东西. 后悔录[D].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心理学全书[D]. 吉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 [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D].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6年.
- [5] 张柱林. 《后悔录》: 穿越现实的心灵欲火[J]. 小说评论, 2005,(06):56-60.
- [6] 胡传吉. 修复历史记忆还原身体经验——论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J]. 南方文坛, 2006,(04):48-51.
- [7] 陈晓明. 身体穿过历史的荒诞现场——评东西的长篇《后悔录》[J]. 南方文坛, 2005,(04):44-47.

作者简介: 俞汶宜(2000-), 女, 浙江台州, 杭州师范大学,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